

# 一位台商 6 张照片中的改革开放 40 年

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上举办集体婚礼，依闽南风俗完婚。黄紫玉是证婚人，她在推进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上做了很多努力。

2016年全国两会上，黄紫玉提交了《关于改善两岸婚姻家庭相关服务政策的提案》，其中的建议被多部门联合采纳，推动大陆配偶及其子女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难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份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第4张照片便是这份提案的获奖证书。

“婚姻问题背后还涉及两岸人员之间的交往工作。我做事的态度和原则就是，只要对社会有利，我就努力去促成。”她将目光放在了民生。她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才能推动两岸交往向更深发展。

黄紫玉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大陆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刚来的时候觉得法规、制度有些还达不到标准，觉得很累。但我也告诉自己，时代在发展，要有信心和耐心。”

“我见证了社会改革发展的艰辛，也看到成就就非常巨大。”为了反腐工作的提案，她去做实际调研，专门请教香港、内地的专家学者。提案提交后，中央纪委办公厅用6页纸做了详细回复。这让她很有收获感，也感慨于有关部门工作的认真负责。

让她倍感欣慰的还有“紫玉”商标侵权案。法院充分考虑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维护了台商的合法权益。“这充分证明了大陆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也提振了台商的信心。”她说。

## 大陆是我们的根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黄紫玉的哥哥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那时候哥哥很帅，是白衣服球队的队员。”过年时，她还会替哥哥给同学们寄些礼物以表问候。“分开几十年了，一个小礼物背后是念念不忘的情分，海峡也分隔不开。”

黄紫玉是两岸关系发展的见证者。2008年，她受邀见证了两岸两会领导人在台北举行的会谈，当时双方签署了空运、海运、邮政及食品安全等四项协议。

黄紫玉还积极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第5张照片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大陆金牌选手和教练交流团到“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座谈交流时的合影。2009年，黄紫玉发起成立这个协会，旨在和平发展、落实基层、成果分享。协会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协会的协调下，北京市的法官们还到台湾的知识产权法院交流调研。

近年来，随着大陆发展和相关惠台政策出台，台胞来大陆投资、工作、求学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公司一位同事，他父母一开始坚决反对他来大陆，但现在熟悉了解后，父母还让他在大陆讨个老婆。”黄紫玉笑着说。

第6张照片是黄紫玉在北京紫玉山庄的照片，她站在绿树青草间，被白鸽围绕。回顾过去，黄紫玉认为，从艰难开始商贸往来，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是改革开放改变了她的人生。“我能够有一个大的平台，去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从中体现我的价值，非常自豪！”

新华全媒头条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  
请扫描二维码或新华客户端  
客户端，订阅“新华全媒头条”栏目



▲上左为第1张照片：童年时的黄紫玉（受访者供图）。上中为第2张照片：上世纪90年代初，黄紫玉在厦门的公司成立时站在红色背景板前讲话（受访者供图）。上右为第3张照片：刚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紫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拍照（受访者供图）。下左为第4张照片：黄紫玉的《关于改善两岸婚姻家庭相关服务政策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受访者供图）。下中为第5张照片：2016年，里约奥运会大陆金牌选手和教练交流团到“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座谈交流时合影。协会由黄紫玉（前排右五）在2009年发起成立，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平台（受访者供图）。下右为第6张照片：黄紫玉在北京紫玉山庄（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李斌、樊攀、乌梦达）2016年，台商黄紫玉特意回福建老家重修了祖坟。“至今我都记得老家五爪兰的香气。”上世纪40年代随家人离开祖国大陆时，她还是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在她记忆最深处的“故乡”，就是家附近的五爪兰，花开时她会采回来，送给妈妈。

如同歌手罗大佑著名的《乡愁四韵》中“一样的海棠红，一样的雪花白”，五爪兰就是她对故乡忘不掉的情结。

改革开放后，她成了第一批回大陆做生意的台商。波澜壮阔40载，芳华岁月化成歌。她珍藏的6张照片，是一个归来游子记录的改革开放40年变迁。

## “其实我叫黄美廉”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第1张照片是童

年时的黄紫玉，相貌清秀，亭亭玉立。她生于大陆，长于台湾，是香港恒丰集团主席、北京紫玉山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连续担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是台湾“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的创会会长。

“其实我的本名不叫黄紫玉，叫黄美廉。”黄紫玉说，从“美廉”到“紫玉”背后的故事，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

黄紫玉的家庭是台湾政商大家庭。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看到大陆方面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呼吁实现两岸“三通”，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正在香港经商的黄紫玉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她开始开拓两岸贸易。初春乍暖还寒，起初并不容易。黄紫玉回忆，当时，她的父兄担心她和大陆做生意会在岛内引来政治麻烦，给了她不小的压力，因此，她在从事贸易时，把名字“美廉”改成了“紫玉”。随着她与大陆的交往不断加深，“紫玉”反倒成为大家熟知的称谓。

第2张照片是上世纪90年代初黄紫玉在厦门的公司成立时，她站在红色背景板前侃侃而谈。那时，她已经和大陆开展经贸往来十余年。

越来越多台商来到大陆，深圳、东莞、昆山……一座座城市留下台商创业打拼的足迹，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成就了无数精彩的台商传奇。

黄紫玉与大陆之间仿佛有种神奇的契合，“人生真的很有趣，每次都赶上了一个节拍。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我开始做两岸贸易；1992年邓小平先生发表南方谈话后，我偶然来北京，恰好赶上北京招商，于是就有了‘紫玉山庄’。”

黄紫玉在大陆创业初期与改革开放一样，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紫玉山庄”原址就是一片垃圾场，她没急着开发，而是挖湖堆山、调水养鱼、植树造林，甚至还执拗地将热带才能生存的棕榈树、芭蕉树驯化后搬到北京，使这里成为山清水秀、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社区，成为大陆都市社区重建生态系统的典型社区。

2008年，应吉林省邀请，她到长白山投资建

设乡村社区，开发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多个项目获生态与建筑最佳结合的国际最高奖。

从商品贸易到经济投资，再到绿色产业发展的先行先试，40年来，黄紫玉与大陆的融合不断加深。“台商在大陆发展，有收获也有奉献，这与两岸的和平发展是分不开的。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一直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就想告诉大家，经济发展不但可以不牺牲环境，还可以再造环境。”她说。

## 一份提案得到中央纪委6页纸回复

第3张照片是黄紫玉刚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时，胸前别着证件，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那之前，她从未想过自己能参政议政。1998年，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黄紫玉的不少提案与建议推动了实际工作。

2017年6月17日，百位来自两岸的新人

过去20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是新加坡、中国两国领导人见面必谈的话题，园区发展让双方都十分满意。“这让我觉得非常欣慰”，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士生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回忆起20多年前那段白手起家的岁月，戴着宽边眼镜、穿着东南亚热带风情花衬衫的曾士生，言语中依然激情流露。

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签署《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苏州工业园区成为中新政府间第一个合作项目，也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试验区。

1994年3月，曾士生接到新方任命后，第一时间赶往中国苏州。为了尽快落实协议，曾士生大胆建议，在新中合资的开发公司尚未组建、建设用地的土地证还没有办下来的情况下，先出资开建一个两平方公里的启动区。

短短两个月后，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正式启动。半年多之后，中新合资开发公司组建，一年之后，苏州工业园区用地拿到土地证，园区建设大刀阔斧地向前推进。曾士生回忆，项目启动一年后，中新两国领导人先后来园区视察。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到访苏州工业园区之后，还把中方馈赠的牌匾放在自己在新加坡的会客室外的签名簿旁边，并附上了英文翻译。

“来拜会李光耀的有很多企业界泰斗。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帮我们招商。”曾士生说。

曾士生告诉记者，当年有些企业原本考虑在新加坡投资，但顾虑新加坡运作成本比较高，新方就会

推荐这些企业到苏州工业园区。在中新共同努力下，到2017年底，已有92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园区共投资了156个项目，累计吸引外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利用外资303亿美元。

1996年从苏州奉调回新加坡后，40岁的曾士生投身政界，当选国会议员，曾任新加坡多个部门的高官，其间为推动中新合作交流做了不少务实工作。21世纪初，他卸任政府公职后，再度投身商界，继续为新中经贸合作奔忙。

24年来，从洼田密布、阡陌纵横到现代化产业新城，苏州工业园区构建起特色产业体系和生态。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两大主导产业正在迈向中高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三大特色新兴产业快速崛起。

今年5月，中国商务部公布2017年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在219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苏州工业园区综合排名第一位，科技创新、对外贸易等关键指标也居于榜首。

继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中新两国又开发了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两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曾士生认为，20世纪90年代在招商引资、利用外资与国际接轨等方面，新加坡可以通过苏州工业园区这个项目提供一些经验供中方参考，现在双方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变成了“大家一起走一条双方都没走过的路”。

（记者王丽娟、夏立新）  
新华社新加坡电

# 浙江两个“无中生有”城市的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义乌在上级对搞自由市场没有明确定论的情况下，率先开放市场，抢占了发展先机，催生了‘华夏第一市’。而龙港因土地有偿使用等制度的创新，不用国家投资，在荒滩上崛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改革开放初期，在浙江有两个“无中生有”的城市名扬海内外。一个是金华的义乌，另一个是温州苍南县的龙港镇。

当时，义乌在上级对搞自由市场没有明确定论的情况下，率先开放市场，抢占了发展先机，催生了“华夏第一市”。而龙港因土地有偿使用等制度的创新，不用国家投资，在荒滩上崛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义乌和龙港当初能够脱颖而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出现了一个勇于开拓、敢于担当的带头人——义乌的谢高华与龙港的陈定模。他们在改革与守旧的思潮交锋当中，敢于踩下改革的脚印，为义乌与龙港发展创造了“腾飞风口”。

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是在1982年。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能使自己增收的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了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

一方面，广大群众为了求变求富已经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求稳守旧的思潮仍然顽固。一些机关部门虽然看到自发形成的路边摊市场利国利民，但因上级没有明确定论，仍把它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打击。

一次，摆摊农妇冯爱倩拦住了谢高华，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老百姓摆地摊”，让谢高华深受触动。他走街串巷深入农户家中调研农民摆摊等经商情况，还带队去温州考察，越调研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精神原则。在当时，谢高华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顺应民意，毅然拍板给被打压的路边摊市场开放绿灯。

义乌不仅为地摊市场松绑，而且发出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一时间，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就像潮水一般涌到义乌。

而在义乌以南的温州境内，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也在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进城行动。

1984年龙港建镇之初，只是几个灯不明、路不平的小渔村。放眼望去，除了一片矮屋就是荒滩。陈定模调研发现，吸引温州农村一批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购地建房和经商办厂，满足他们想跳出“农门”做“城里人”的愿望，是龙港城镇建设的出路。

但是，首先碰到的禁区是旧体制下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陈定模就研究当时的中央政策，从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找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按非

农业户口统计。”这句话作为依据，发布“凡在龙港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入口进龙港镇。”解决了农民落户问题，在当时，这在全国是一个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胆创举。

面对建镇亟须大量建设资金，陈定模从报章看到国外通过出让土地获得资金建设城市的做法，大胆拿来为龙港所用。推出了以征收公共设施费出让土地的方式，向投资落户者筹集城镇建设资金。在全国开创性地进行了土地有偿使用的实践。

这两项大胆改革举措，掀起了农民造城旋风。当时，镇会议室里悬挂的巨幅“龙港规划图”前，天天人挤人、肩擦肩。高峰时的1985年，全镇3000多间楼房同时兴建，来自各地参加造城的有37支建筑工程队，4000多个木匠、泥水匠，3000多个杂工，加上建房主人，每天上工地的就有1万多人。

义乌和龙港“无中生有”的崛起，那段改革者的故事，是浙江精神的生动写照。当年，谢高华和陈定模这样的基层领导干部，不惜拎着“乌纱帽”为改革发展探路的实践表明，只要敢闯敢冒，就能抢占先机，就能无中生有，没有资源可以整合资源，没有市场可以创造市场。

经过40年的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惟其艰难，才显勇毅。谢高华和陈定模这种敢担当、敢作为、善创新的精神，契合了新时代的需要，对当下深化改革尤其珍贵和值得弘扬。新时代需要呼唤更多的“谢高华”“陈定模”。

（本报记者谢云挺）

# 「大家一起走一条都没走过的路」

访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士生